

中國國民黨黨史

歡 迎 翻 印

中華民國十七年一月出版

編輯者

河南省政府宣傳處出版科

發行者

河南省政府宣傳處出版科

印刷者

河南印刷局

代售者

河南省政府宣傳品售賣處

定價 每册工料洋四角

中國國民黨史概論

導言

汪精衛講授並手自記錄

兄弟覺得對諸君講授中國國民黨史，實在有點困難，因為我們現在還未能够有一部完全的黨史，而做黨史這件事情，也確實是不容易的，大概總要經過下面的三種手續，方纔有個頭緒。第一是蒐集史料，先把一切關於本黨經過的事實，蒐集起來，作為黨史的材料。所謂材料，決不能單靠着文字的記載，於文字的記載以外，還有許多事實，留在同志的腦海裏，必要假以時日，煩他們將腦海裏的記憶，記載出來，纔能把幾十年來本黨的事實，得較為豐富的記載，這件事情，必須速做，否則一個同志死了，他腦海裏記憶的事實，也就隨之埋沒。第二是審定史料，我們一面蒐集史料，一面將蒐集得來的史料，加以精密的審定，能分別真假，這番工作，比蒐集史料，還要繁難。第三是編纂史料，於審定史料之後，必須將所審定的條分縷晰，綱舉目張起來，然後可以做成一部有系統的黨史。以上三種手續，苟缺其一，黨史便做不成。如今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雖經指定專員，著述黨史；却因為這三種手續，還沒完備，所以黨史急切還不能做成。在未有黨史以前，講授黨史的困難，可想而知，何況兄弟在此講授黨史的時間，統共祇有十點鐘，欲在這短少的時間，講授繁重的黨史，實在更是困難。所以兄弟打定注意，不叫做講授黨史，而祇叫做講授黨史概論，所注重的不在各個的事實，而在幾個重要的概念，因為概念清楚，則於黨史，

已得其綱要。所謂幾個概念，第一是革命運動的時代背景。第二是革命的主義及政策。第三是革命黨的組織及紀律。在這十點鐘內能否將這幾個概念解釋明白，尙不可知，但總要儘先將他講完再及其他概念。諸君須要知道，中國最近幾十年來革命的事實，幾乎可以說是本黨的事實，本黨的名稱，有興中會，中國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而本黨的主義，是始終一貫的。始於本黨總理孫先生之創做，繼以全國人民之信仰贊成，日多一日，中國革命運動，因以日益擴大。所以本黨的運動，便是中國的革命的運動，因爲除了本黨之外，中國沒有第二個革命團體，這是數十年來顯著的事實。兄弟敢信，諸君明瞭這種關係之後，必然增加對於本黨之信託，同時增加對於中國革命之決心與勇氣。

第一章 中國最近之革命運動之時代背景

這一章要分以下幾節來說明

第一節 革命何以發生

從科學眼光看來，無論那一樁事實，決不會無緣無故，突然發生的，必須那個環境，需要着那種事實，然後那種事實，纔會發生，革命也是人類一樁事實，決不能逃此例外，所以要知道革命何以發生，必要先知道那時代處環境，是怎樣的。

我們知道，如果那時代不需要革命，則革命決不會發生，祇是所謂需要，有兩種必要條件，方纔顯出。一是怎樣知道需要。二是怎樣得着需要，這最好拿一個譬喻來說明，一

個人病了，往往不知道是有病，知道是有病了，往往不知道是什麼病，知道是什麼病了，往往不知道怎麼醫法，這三層知識，一層比一層困難。一個人病了，總覺得不舒服，覺得辛苦，却往往不知道這就是病，至於知道是什麼病，非醫生不能，知道要怎麼醫法，更非醫生不能。病人是需要醫治的，而對於自己的需要，不容易知道，不容易得着，具如此。國家之有存亡危急，如人之有病一樣。國家有存亡危急時，需要革命，猶人病時，需要醫治一樣。一個人對於自己的病，尚且不容易知道，何況一國人民，對於國家之危急存亡，如何容易知道，所以有時國家危急存亡，已在眼前，而一國的人民，尚以爲太平無事。一個人對於自己是什麼病，尚且不容易知道，何況一國的人民，對於國家之危急存亡，如何容易知道根本級所在呢？所以有時對於國家危急存亡，雖然知道憂懼，却於國家危急存亡之所以然，完全是隔靴搔癢。一個人對於自己的病，應該怎麼醫法，尚且不容易知道，何況一國的人民，對於國家之危急存亡，如何容易知道救治呢？所以有時雖然知道國家危急存亡之所以然而於怎樣救治竟和病急亂投醫一樣。人病時須有醫生，猶之國家存亡危急時，須有革命。醫生認定病人的病狀，非用解剖手術，不能痊愈，便無疑無貳的要施行解剖手術，先於施行解剖手術之先，必要病人明瞭自己的病狀，知道非用解剖手術，不能痊愈，醫生方纔能够奏刀，這就和革命之必要宣傳一樣，施行解剖手術之際，病人不免流血，不免痛苦，這就和革命之必要流血痛苦一樣，施行解剖手術之際，如果不慎，往往使

病人的痛苦延長，甚至苦痛增加，這就和革命之際，方法不善，必致延長或增加國民痛苦一樣。醫生的本意，是不要病人受痛苦的，然不施行解剖術，無痊愈之望，故祇能使病人稍受痛苦，以求痊愈，這就和革命之以犧牲為幸福的代價一樣，所以革命者之於民衆，猶之醫生之於病人，第一要他知道為什麼要革命，第二要他知道如何革命，這裏頭固貴乎有知識有技能，而尤貴乎有熱誠有道德。

如上所說，可知道革命之所以發生，是那時代需要革命，詳言之，是那時代，國家已陷於危急存亡，除了革命，沒有其他救治的方法，所以纔發生革命，不過時代的需要，往往不容易顯出，所以纔須研究怎樣使人知道需要，和怎樣使人得着需要，革命運動之艱難百折，委曲繁重，皆由於此，祇因為既有此事實，便不得不然，假如沒有此事實，而硬去革命，便和將一個無病的人，硬抬入解剖室一般，那就成了笑話了。

第二節 中國以前發生革命之原因

中國以前何以曾發生革命呢，中國四十多年的歷史，往往有革命的事實，中國人民之能革命，已於歷史上得了證明，至於中國人民之何以要革命，也於歷史上得了回答。

先就民族來說，拿歷史來看，可以說中華民族確是能够獨立的經過四千多年，他還能巍然存在，國家雖然給人亡過，民族決不曾亡過，對於異民族的壓迫，往往能將他們同化了去，不說夏商周，春秋戰國，秦漢，三國，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這些朝代，都是漢之匈奴，都不曾和中華民

時候，五胡亂華，國家便亡了一半，但民族依然存在，南宋的時候，女真人寇，國家便亡了一大半，但民族依然存在，及至蒙古人寇，中國整個的國家便都給他亡掉了，但民族却還是不曾亡掉，及至滿洲入寇，中國整個國家又給他亡掉了，但民族却還是不曾亡掉。中國亡於蒙古九十多年，亡於滿洲二百六十多年，何以國家雖亡而民族尚存，因為中國自有歷史以來，和異民族相遇，祇有政治上、軍事上的失敗，沒有文化上、經濟上的失敗，我們要知道，政治軍事是國家所以存在的條件，文化經濟，是民族所以存在的條件，我們在政治上軍事上，雖失敗，而文化上、經濟上却没有失敗，所以國家雖亡，而民族不亡，民族既然存在，當他們政治軍事勢力強盛的時候，以文化經濟做自己民族的掩護，等到他們政治軍事勢力衰弱的時候，便起來將他們驅逐，恢復自己已亡的國家，到那時候，他們不是驅逐了去，便是同化於我為一民族了。

就民權來說，拿歷史來看，中國國家雖沒有民權的制度，中國人民，却不能說沒有民權的思想，孔子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孟子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又說：民為貴，君為輕，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其他類此的話，在古人典籍中，往往看見，黃梨洲原君一篇，說得更為透澈。中國人民，因為有此思想，所以對於君主暴虐無道，民不堪命的時候，人民便冒起來革命，

好像是天然的道理，和人民正當的權利一般，便是歷史家也承認人民有此權利。對於秦二世，隋煬帝等時代，人民革命，都左袒人民，不左袒君主，所以我們雖然不能說中國國家民權的制度，却不能不說中國人民，沒有民權的思想。

就民生來說 凡是人民要求革命，其最大原因，都是由於生計之壓迫。拿歷史來看，所有革命表面上是原因於君主之無道，政治之腐敗，實際上，却是因為君主無道，政治腐敗的結果，以致人民生活，沒有保障，社會經濟，備受壓迫，一般人民，窮無所之，遂不得不挺而走險。歷朝末造，所醞釀出來的革命，沒有不是如此的，試拿明朝來說，明朝之亡，人都知道是亡於滿州，然使那時沒有李自成張獻忠一般盜賊，擾亂西北，明朝還不至沒有餘力對付滿洲。李自成張獻忠做賊的原因，由於搶米，所以當時有米賊的綽號，當時西北一帶，民窮財盡，於此可見。西北一帶，所以民窮財盡的原因，却因為倭寇擾亂東南，不能不竭西北之財力，以轉輸軍費。然則東南荼毒，延及西北，以致東北亦受其弊。由此說來，革命原因，實發源於民生問題，真是古今中外，所莫能外，不過沒有民生主義來解決他，所以止於大亂一場，得不到長治久安的結果便了。

如此說來，中國從前所以發生革命，完全由於時代需要，不過一般人民，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於為什麼要革命，既不甚明白，於如何去革命，更不甚講求，自然得不到革命的完滿效果，祇弄成一治一亂的局面，其實所謂治，不過亂之後，人思寧息，所謂

亂，也不過醞釀既久，偶然爆發需要革命的原因，是無時不存在的。

第三節 中國最近發生革命運動之原因

中國以前之革命，其原因已如上述，所以最近之革命，其必要與可能，絕無疑義。就民族來說，中國從前既然能驅除蒙古，自然必能驅除滿洲。就民權來說，以滿洲最近數十年來，君主之無道，政治之腐敗，自然會發生革命。就民生來說，最近數十年來，民生之凋敝，社會之枯窘，自然會逼一般人民走向革命那一條路去，這真是二十四史上，一個依樣葫蘆，絕不會有例外的。祇是最近數十年來，中國之革命運動，和以前之革命，有大大不同的一點，這一點是什麼哩，是中國最近數十年來之環境，中國最近數十年來之環境，是以前所沒有的，上頭說過，中國四千年來，與異民族相遇，祇有政治上軍事上之失敗，沒有文化上經濟上之失敗。却是最近數十年來，所遇著的民族，和以前絕不相同，他們有所謂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之根據，固在於修明政治，強固軍事，尤在於經濟之發展，向文化之發展，與經濟之發展，互為因果，例如十九世紀以來，英國因為工商業發達便動求製造，發明機器，結果科學發達，使歐洲文化，煥然一新，又因為文化發達，便出產豐富，交通便利，結果工商業發達，其勢力普及於世界，論起政治修明，軍事強固，經濟發展，文化昌明，本來不是壞事，甯可說，凡是國家，凡是人民，皆當致力於此，無如那時代英國及歐洲各國的生產制度，完全建築於私人土地資本之上，以致生產機關，為私人所壟

斷，生產利益，也爲私人所壟斷，所謂文化與經濟，成爲私人之享樂品，所謂政治軍事成爲私人之保障物，少數私人得此憑藉，對於國內，便壓迫一般勞苦民衆，對於國外，便壓迫一般異民族，對於異民族及其所居住之土地，創出一個殖民地名詞，將殖民地人的勞力，及土地的生產，滿他掠奪原料的慾望，同時利用這些原料，製成商品，銷售於殖民地，供他擄取利益的慾望，這兩重慾望，向民殖民地取夾攻的形勢，真是威逼利誘，無所不至。從前所謂亡國，政治上軍事上失敗便算了，如今殖民地主義，所謂政治軍事不過是一種手段，其目的乃在於經濟之吸收經濟枯窘，文化自然也使枯窘，所以其結果，不止亡國，真是滅種。最先更爲殖民地的是美洲，其次非洲及印度，其次澳洲及南洋羣島，其次自然是東亞了。中國和這些帝國主義相遇，不但政治上軍事上發生劇烈的鬥爭，經濟上文化上也發生劇烈的鬥爭，不但決國家的存亡，而且決種族的存滅。

此種劇烈的鬥爭，以鴉片戰爭爲開幕，直至今日劇烈的程度，有增無減。

如此說來，中國最近之革命運動，除了以前革命所有的各種原因，依然存在之外，還添了一種新的原因，這一種新的原因，比之以前更爲嚴重，更爲迫切，所以中國最近時代需要革命，比之以前，其程度何止百倍加甚，換句話說，從前革命推倒無道君主及異民族侵掠，便算滿足，如今革命，却是要推倒帝國主義。

第四節 中國最近革命運動與時代背景

照以前所說，中國最近需要革命，已無疑義，祇是如何纔能顯出這需要呢，換句話說，便是如何纔使人知道需要呢。

說到這裏，我們對於創始中國革命運動之先知先覺，本黨總理孫先生，當表敬意。

今年三月十二日，孫先生卒於北京，遺囑第一句是『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今年是西歷一九二五年，上溯四十年，是一八八五年距鴉片戰爭，已四十五年了。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曾發生過一回革命，是爲太平天國之役。在中國革命史上，雖然放出異彩，但其大體，究竟和劉宋朱明差不多，只能算入中國以前的革命之範圍裏。中國最近革命之第一幕，不能不說是一八八五年，那年孫先生立志顛覆清廷，創建民國，是爲第一時期的開始。由此十年至一八九五年，孫先生起第一次革命軍於廣州，是爲第二時期的開始。由此十年至一九〇五年孫先生成立中國同盟會本部，是爲第三時期的開始。由此十年至一九一五年孫先生統率中華革命黨與軍閥及帝國主義苦鬥，是爲第四時期的開始。由此十年至一九二五年孫先生遺命中國國民黨繼續國民革命的工作，這可說是第五時期的開始了。以上四十年，劃分做四個時期。每一時期爲十年，并非有如此明瞭整齊的劃分，不過爲讀者容易記憶起見。然劃分的大體，也還不錯，更有可以幫助讀者記憶的，就是一八八五年的時候，有中法戰爭及媾和。一八九五年的時候，有中日戰爭及媾和。一九〇五年的時候，有日俄戰爭，一九一五年的時候，有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一九二五年的時候，有青島，九江，

漢口，上海，廣州各處慘殺案。這些帝國主義的侵略狀況，恰恰與國民革命的運動，作一對照，更容易發人深省，使人得明瞭而深刻的印象，還有可以助讀者記憶的，今年爲一九二五年，歲在乙丑，上溯十年，歲在乙卯，上溯十年，歲在乙未，上溯十年，歲在乙酉，整整的四十年，我們知道，這四十年內，中國的革命運動，是怎樣的，時代背景，又是怎樣的，便可知道，那時代怎樣需要革命，與革命怎樣適應於時代之需要了，

(甲)第一時期

距今四十年前，孫先生立志顛覆清廷，創建民國的時候，也就是中法戰爭的時候，那時代背景，是怎樣的，試述如左。

一。外交方面 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者，爲取得經濟侵略的基礎，不斷的用軍事侵略，爲達到目的之手段，英法聯軍攻破廣州之役，及攻破大津北京之役，都是用這種手段的特徵。自從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締結以後，滿洲政府，對於帝國主義，不敢輕開戰釁，而帝國主義，在中國亦已取得經濟侵略的基礎，覺得不必再用軍事侵略，已可達到目的，於是變換手段，由威逼而利誘，以買收滿洲政府之心，這種攻心政策，較之戰爭，更加利害。英國遣洋槍隊，幫助滿洲政府，打倒太平天國，以致滿洲政府，感激英國，事事順從，這便是最著的例，在那時候，滿洲政府，早已把破北京，燒圓明園一場惡劇，付之九霄雲外了，況且在那時候，太平天國，已被打倒，滿洲政府，自命中國，一般君臣，興高

彰烈，方以爲子孫萬年之業，從此無憂。須知道，革命之發生，總在國家危急存亡的時候，一般人民憂心宗國，岌岌然不可終日，方纔不惜犧牲流血，如今既歌舞太平不暇，又何從感覺革命之必要呢？

二・軍事方面 太平天國，被滿洲政府打倒是由於曾國藩李鴻章一般人，練什麼湘軍，効忠滿洲政府，所以得最後的戰勝。自此之後，湘淮諸軍，得了翊贊中興的名譽，一直到乙酉中法之役，這種名譽，還是維持，在此役，中國軍隊，并沒甚敗仗，諒山之戰，還打了勝仗，中國軍隊的腐敗，還沒有十分暴露，滿洲政府的威信，還沒有十分倒霉。從來革命之發生總在政府失了威信之後，人民覺得政府沒有什麼可怕，而作惡如故，方纔容易發生反動，如今滿洲政府既然還能維持威信，革命的可能，便沒有十分把握了。

三・社會方面 革命是一件革故鼎新的大事，最近革命，在民族民權民生三方面，澈底改造，尤其是大事中之大事，倘使人民對於改造，沒有極大的覺悟和決心，革命是沒有可能的。中法戰爭的時候，中國人民的心理，是如何呢？先就物質文明來說：自從鴉片戰爭以來，海禁大開，歐洲一切工藝品次第輸入，至少可使國人對於物質文明得一認識，知道機器製造品，非手工業製造品所能望了。然而異民族間相遇，彼此都不免有排拒的感情，在各有文明的異民族間相遇爲尤甚。在四千年來，以文明自負的中華民族，更其特別加甚，所以當時一般國人，對於歐洲之物質文明，竟會不能認識。

如今試述一兩件事，曾國藩和太平天國打仗，最得力的是水師，他的水師，是他所手創，有長龍快蟹等等名目，縱橫長江上下，得意非凡。他做兩江總督的時候，有一日在安慶城樓上，憑視水師，正在神遊目想之際，忽然的有一條英國小火輪，風馳而過，那些長龍快蟹，一霎時便浮沉不定起來，曾國藩看見了，心頭一急，便吐了一口血，這是曾國藩的聰敏過人，他自從見了這小火輪，知道自己幾十年辛勤訓練的水師，全靠不住，所以後來他便派五百學生到美國去留學，在上海和南京設立製造局，提倡格致。曾國藩這個人，算是對於物質文明，能够認識的。李鴻章因為曾經利用英人戈登的洋槍隊，打破太平天國的李秀成，所以對於物質文明，也能够認識，只是當時的一般士大夫，能够如曾李二人的，實在是最少數。不用說別的，即如彭玉麟之流，他帶慣了長江水師，他便說長龍快蟹，比小火輪還要便捷，他們不只反對輪船，他們還要反對鐵路，當時吳淞新築鐵路，恰巧上海發生瘟疫，他們便說瘟疫是鐵路惹來的，將鐵路拆了下來，投之江中，以輪船和舢板比較，以民車和獨木輪車比較，這樣簡單的事實，他們尚且認識不清楚，其他一切物質文明，不能認識，更何待說。對於物質文明，尚且不能認識，則對於精神文明，如倫理道德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等等，其不能認識，越發不用說了，所以當時日本雖然已經全副精神去做維新事業，而中國依然糊糊塗塗的，在那裏混日子，男子儘管講究做八股，女子儘管講就纏小脚，此外什麼事都不管。須知道革命之發生，由於精神生活，生了變動，對於

國家社會，感覺得有改造的必要，纔會有破壞的決心，和建設的希望，像那時候社會方面，如此混沌，那裏有革命發生的可能呢。

照以上所說，可知道在乙酉中法戰爭的當時，中國社會實在沒有發生革命的可能，雖然自從鴉片戰爭以來，革命的需要已經非常迫切，而在這般社會裏，實在無從着手。我們論到這裏，不能不佩服孫先生的先知先覺，他在那時候，只有二十歲左右，他看破了中國的情狀，立志顛覆清廷創建民國，因中法戰爭一役，知道帝國主義對於中國侵略的劇烈，萬萬不能坐視，又知道滿洲政府若不推倒，則反對帝國主義的工作，無從做起，他顛覆清廷的思想，是從此得來的。一半是鑒於目前形勢，一半是繼承中國民族固有的思想，他創建民國的思想，却是從幼時在檀香山一帶，看見美國民主政治的模樣，加以研究英文的結果，知道世界的大勢，和民主主義的潮流，又因為研究中國歷史的結果，知道歷朝革命所費時費力的，不在乎推翻舊政府，而在乎革命之後，羣雄角立，人人把著爭王爭帝的思想，所以亂個不休，惟有創建民國，纔可以免此禍患，如此說來，孫先生在當時將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已經確立了。

只是在當時社會中，以何憑藉來實現這般理想呢？明亡之後，中國的民族主義，寄存於兩大派人物之中，一大派是讀書人，從前所謂士大夫，如今所謂知識階級，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諸先生，爲之領袖，能將民族主義普及於一般讀書人心裏，但是不久便被

什麼博學鴻詞科，將一般讀書人都騙了去了，有了翰林進士尙書侍郎，還管什麼民族主義，及至太平天國出來，一般讀書人，還抱定了「君臣之義已定，夷夏之辯不容再存諸心」的思想，拼命幫助滿洲政府，來打倒太平天國，如今正是歌舞中興的時候，這一大派人如何可以和他說革命呢？又一派是勞動者，從前所謂下流社會，如今所謂勞苦民衆，陳近南先生爲之領袖，能將民族主義普及於一般勞動者的心裏，創立了三合會，三點會，天地會等秘密團體，以反清復明爲口號，他們不是讀書人，沒有翰林進士尙書侍郎等願望，所以民族主義，在他們社會裏，比較能够固結。二百六十多年來，他們對於滿洲政府，起了不少的反抗，太平天國一役，更是發揮盡致，及至太平天國敗了，什麼哥老會等，都被一般所謂中興名臣買收了。論起來，不讀書便不容易做官，這是他們的好處，然而因不讀書，便沒有知識，便容易被利用，這是他們的壞處，雖然是總比讀書人好得多，然而在那時候，民族主義在他們社會裡，已成死灰，又如何可以和他說革命呢？

照此說來，孫先生在那時候，要做革命，可以說毫無憑藉，縱使勉強做去，必定失敗，無可疑的，但是革命的最大本領，便是不顧目前的失敗，以求將來的成功，所以孫先生在那時候，明明知道失敗，却偏要拚命做去，他在士大夫社會和勞動者社會，用了不少的力去做革命的宣傳和組織，他落得了一個瘋癲神經病的徽號，能贊成他的不過是少數的幾個人。他在這時候，除了在香港澳門廣州秘密運動之外，他還周歷長江一帶，直至北京蒙

古，實地觀察中國大勢，和社會情狀，以儲蓄他革命的勢力。所以自一八八五年至一八九五年，這十年之間，只能名爲革命醞釀時期，在這時期之中，孫先生的著作，只有一篇給李鴻章的信，有人看見了這一封信，便以爲孫先生當時的政治思想，還不過是一些富國強兵的政策，還不曾有顛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其實這些不過是孫先生表面的文章。他既然要周行內地，深入北京，自然不免要有這外交手段，不但致李鴻章的信是如此，便是當時所謂興中會的章程，也深藏革命的色彩，這是秘密結社秘密行動應有的事。要知道孫先生當時真正的志尙，當以他所自著的孫文學說，第八章爲斷。

在第一時期，即革命醞釀時期、雖沒有什麼顯著的事實可記、然却有顯著的意義，可以使我們認識的，一是革命的人應該有極銳利的目光，看出時代的需要。二是看出之後，便要領着羣衆向前去做，不要以爲那時代尙不能做，便不去做，這叫做適應時代，也叫做促進時代。

(乙)第二時期

一八九五年，孫先生起第一次革命軍於廣州，那年是歲在乙未，正是有名的甲午中日戰爭的翌年，那時代背景，是怎樣的，試述如左。

一。外交方面 乙酉中法戰爭之役。中國的外交方面，雖然是隱患潛伏，還沒有到爆裂的時候。由此十年，至於甲午中日戰爭，外交上的形勢，便不同了，滿洲政府之腐敗